

# 讲述地道中国故事 塑造典型农民形象

## 贺享雍作品《乡村志》引来专家好评

本报讯 前不久,由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,四川文艺出版社,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,中共渠县县委、渠县人民政府主办,四川省作协创研部、达州市文联协办的贺享雍《乡村志》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。研讨会由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主编王山主持。

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、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出席会议并致辞。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,批评家雷达、胡平、贺绍俊、何向阳、程绍武、范藻、刘艳、杨庆祥等围绕贺享雍作品的艺术特色、思想价值等展开了深入讨论。

贺享雍是渠县一位乡土文学作家。20多年来,他以一个作家的道义、良知和责任,把心交给农民,真实地抒写了发生在父老乡亲们身上的那份苍凉与沉重,直面他们的痛苦、欢乐和追求,先后创作了《末等官》《苍凉后土》《怪圈》《遭遇尴尬》《土地神》等中篇小说和《乡村志》系列作品。

据介绍,《乡村志》系列是贺享雍于2008年开始构思并写作的一套全面反映中国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。《乡村志》系列小说拟创作十卷,力图全景式呈现当下中国的乡土社会现状。这一系列作品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,目前已完成九卷,第九部作品《大城小城》已刊载于《中国作家》杂志2017年第7期。

《乡村志》以共和国建国半个多

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农村生活为重点,以作者熟悉的川东家乡人物为描写对象,以志书式的实录方式,再现了共和国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农村历史,并忠实记录农民在这些历史变迁中心理与情感上的巨大波澜。《乡村志》每卷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,突出表现一个不同的主题,但各卷故事均有所照应和衔接,人物亦有所交叉,从而让全书成为一幅气势恢弘、人物众多的清明上河图似的当代农村生活图景。

吴义勤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贺享雍乡土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。他认为,贺享雍的小说接地气、有情怀、有温度,他的写作手法朴实无华,是一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厚实的现实主义创作。贺享雍的小说讲述的是地道的中国故事,塑造了典型的中国当代农民形象,显示出乡土文学在今天仍然具有巨大的文学潜力和发展空间。吴义勤提到,贺享雍在写作中始终坚持农民的立场,他的写作来源于真切的生命体验,具有野生的、民间的、原始的力量,他对自己笔下的农民有理解有同情。因此,他的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丰富、立体、生动,虽不是光芒万丈,却能够立得住。总的来说,贺享雍的创作对我们今天的乡土中国有很好的思考和表现,也代表了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维度,值得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。

与会专家认为,贺享雍的写作承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富资源,对于当下农村生活中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现状都作了全方位、立体式的呈现。在写作中,贺享雍始终坚持与农民站在一起,用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进行书写,因此,《乡村志》系列作品充满着土生土长的乡村现实和毛茸茸的生活质地。贺享雍通过书写自己笔下的贺家湾,刻画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们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生命历程,展示了中国乡村、中国农民的力量和蓬勃的生命力,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此外,贺享雍的小说语言鲜活生动,有烟火气、有幽默感,令读者感受到天然的真切感和亲近感。

“因为我是农民,所以几十年来,我坚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。”在分享自己数十年的写作历程与心得体会时,贺享雍说,“当我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,我自觉把我对农民的关怀和贴心呈现在笔下,这是我的天职也是我存在的价值。我秉着为农民发言的创作宗旨,力争在《乡村志》里写出一个真实的乡村,一个在大时代背景下经历着变化和阵痛的乡村。”贺享雍表示,将坚持自己的创作理想,从土地出发,在渠县这个故乡,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,像巴尔扎克一样做一个时代的书记官,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,也让自己的内心得到充实和快乐。

(特约记者 杨东)

## 王万邦御倭



王万邦故居

从渠县涌兴镇涌西村进入安北乡双凤村王万邦故居,有守台副将王万邦墓,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□戴连渠 文/图

王万邦(1760—1827年)清代守台名将,台湾北路协副将。清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出生于渠县太平里龙井湾(今安北乡凤山村,目前与双堰合并叫双凤村)。他从小熟读兵书,苦练武艺。据传其身高体壮,可抱水牛为其洗澡,故居后仍有练武场和洗牛池。乾隆四十八年(1783年)中武举,“遵例随营,应征湖北”。

嘉庆元年(1796年),清东乡(今四川宣汉)白莲教白首首领王三槐与冷天禄、张子聪等率众爆发起义,共同进攻通江、长寿、垫江、渠县等城。势力逐渐强大,地方无力征伐,皇上问计于人,有人

建议非王万邦不可。嘉庆三年,王万邦随清军出击义军,王三槐被擒。因功受赏,嘉庆十四年(1809年),调幽燕(今河北省北部及辽东省南部)任清军直隶督标良乡管守备,嘉庆末(1820年)任福建漳州镇平和营游击。

王万邦南御北剿,征战频繁,立下汗马功劳。嘉庆帝赐封其武翼大夫。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,因其骁勇善战,王万邦奉旨调至台湾彰化协镇都督任协镇都督,接替徐廷荣并兼任北路协副将,授职正三品。身材魁伟,胸怀报国大志、深谙兵法而善于指挥作战的王万邦守护台湾,立足积极防御,加强军事操练、布阵演习、武器制造与工事构筑,坚决抵御来犯的日常。他矢志精忠报国,战必身先士卒,随军守渠兄弟,也奋勇当先。在一次海战中,他的胞弟王万选、王万安不幸丧身,沉没海底。王万邦将痛失手足的深仇大恨化作护疆保国的御敌斗志。他依靠台湾民众,发展生产,增强实力,安定内部,统一民心,实施军政结合、军民结合,共筑御敌长城于海岛,使“蛟鳄敛迹而蠢类畏

威,岛屿风清而群黎载德,海甸修文,荒裔感化”,守住了清朝的海岛和海域,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。

在台湾任职七年中,他军纪森严,英勇善战,多次抵御倭寇入侵台湾,功绩卓著,受到台湾人民的赞颂,并多次受到清代朝廷的嘉奖和封赏,曾五次受赐“奉天诰命”,以此表彰他的功绩,追赠他的曾祖父、曾祖母、祖父、祖母和父母的官爵。

王万邦解甲归田后,回到渠县家乡,“课二子,耕勤时,复手种竹树”。清道光七年(公元1827年)病死于家中,时年六十七岁。死后,道光皇帝诰封他为“武翼骑都尉”(正三品),并发银开四十大普孝。敕建分华表、石狮石马石人、墓前立牌坊,墓碑精雕花鸟人物,正中高悬“圣旨”。墓碑载:英崛起戎行,扫清妖孽,躬膺荣禄,善始而善终者古来有几人哉。如公以武举遵例随营,调征湖北,身先士卒……

王万邦墓高大巍峨,气势雄浑。为4柱三室,柱前砌三角形护石,上刻图案花卉。中为主室居高,左右耳室次之。各室墓首浮雕人物故事、飞禽游鱼、花木盆景、龙杖佛珠、宝剑兵书及文房四宝等图像。主室墓门雕刻有几何图案花窗,上方横额刻“宠命世承”四字,再上竖刻“五龙捧旨”图,房面作飞檐、筒瓦,脊端雕翼。墓前石雕卫士对峙。石马、石狮至今保存。两根滚龙抱柱华表高约丈余,可惜已毁。其碑恭楷“皇清诰封武翼骑都尉王公讳万邦老大人墓”。1991年5月,该墓被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王万邦墓

# 人性的黑白两面

## ——观电视剧《白夜追凶》

□徐冬

盘点2017年的国产剧,《白夜追凶》无疑是一匹引人瞩目的“黑马”:没有天价的投入,没有当红一线演员担纲,播放量却超过40亿,更在豆瓣上拿到了9.1的高分。不久前,在第五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,《白夜追凶》的海外发行权又被世界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Netflix买下,将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,该剧由此成为首部正式在海外大范围播出的国产剧。

平心而论,悬疑侦探是比较讨巧的题材,即使演员演得再烂,先凭剧情,也能吸引着观众一口气看完,近年来的《法医秦明》《十宗罪》《心理罪》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,很大程度的原因就在于此。《白夜追凶》也概莫能外,扑朔迷离的案情、环环相扣的推理令人脑洞大开,直呼“过瘾”。尤其在剧中最后两集,当“栽赃关宏宇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”这一该剧最大的谜团得以揭晓时,估计所有的观众都会惊掉下巴,因为没有谁会想到,陷害关宏宇的竟是他的孪生哥哥,同时也是剧中一直以“正义化身”形象示人的关宏峰。正如有观众所评价的那样,在剧情上,《白夜追凶》是不折不扣的“烧脑无限版”。

不过,题材的讨巧并不是《白夜追凶》取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,演员精湛的演技以及剧中对现实、对人性深层次的拷问和打量,才使得该剧在质上得以提升,这点和电影《沉默的羔羊》有相似的地方。作为一部低成本电影,《沉默的羔羊》能在1992年的奥斯卡奖评选中大获全胜,固然与其悬疑惊悚的剧情密不可分,但更得益于米迪·福斯特和安东尼·霍普金斯炉火纯青的演技,以及剧中对犯罪心理的深层探究等等。同样,在《白夜追凶》中,几乎所有的演员,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在用心地表演,尤其是男主角潘粤明,其演技真可用“炸裂”一词来形容。在剧中,潘粤明一人扮演四个角色:关宏峰、关宏宇、假扮关宏峰的关宏宇、假扮关宏宇的关宏峰。虽然是孪生兄弟,但关宏峰和关宏宇的个性截然不同:哥哥高冷阴沉,弟弟阳光开朗;哥哥一脸正气、正襟危坐,弟弟玩世不恭,放荡不羁;哥哥木讷不解风情,几乎和女人“绝缘”,弟弟是“撩妹”高手,阅人无数。把性格反差如此大的两个角色演好已经是巨大的成功了。然而,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,当关宏宇假扮关宏峰或关宏峰假扮关宏宇时,潘粤明又在细微处巧妙地露出了假扮者的破绽:关宏峰习惯思考时摸下巴,而关宏宇会在微笑时耸眉毛;当弟弟假扮哥哥时,摸下巴的动作会生硬一些,而当哥哥假扮弟弟时,耸眉毛的动作也会不自然。潘粤明之外,王泷正饰演的刑警队长周巡表面大大咧咧实则心思缜密,梁缘饰演的实习女警周舒桐既呆萌可爱又青春热血,就连戏份不多的杨凯迪所饰演的酒吧女刘音也尽显“大长腿”魅力,风情万种。

凡事都是双刃剑,悬疑侦探剧虽然仅凭剧情就能牵着观众的鼻子一口气看完,但过分依赖剧情也造成了它思想深度挖掘不够、缺乏寻味的不足。一句话,当第一遍看完,解开了悬疑谜团后,观众就很少会看第二遍了。这就如同喝高度的劣酒,喝时固然火辣淋漓,但事后没有余香值得回味。即便是相对优秀一些的悬疑剧,也仅在犯罪心理方面有一些探究,却也集中在童年心理创伤、身体畸形导致心理畸形、被侮辱被损害者报复社会这些方面,新意并不多。直到《白夜追凶》的出现,悬疑剧才在思想深度上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。

## 吴樵与梁启超谭嗣同

□刘家黎

维新变法的激进派谭嗣同与梁启超是经吴樵介绍才认识的。

吴樵(铁樵)名以樵,字樵,吴德潢长子,原达州宝芝乡白衣庵人(1948年划归平昌县),生于1866年。吴氏家族系蜀中名门望族,祖父吴铤,道光进士,咸丰年间先后任云南澄江、曲靖知府。叔祖吴颢,咸丰进士,监察御史,为东乡(今宣汉)袁廷蛟冤案昭雪立过大功。父吴德潢,考第三举人,维新变法时,与黄遵宪、梁启超、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,先后任浙江山阴、钱塘、西安知县,为官清廉,卓有政声,在西安任上被惨杀。樵曾与父亲一起共同谋划创办上海《时务报》,与父客寓京时,介绍谭嗣同(“晚清四公子”之一,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,湖北巡抚谭继洵子),梁启超(戊戌变法主将、宣传家、中国近代“百科全书”式的人物)认识,三人结为弟兄。

梁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称:“余与谭浏阳及铁樵约为兄弟交,而事季清先生……吾三人者,连舆接席,未尝一日相离也。”“余初交铁樵,在京师,实乙未秋,与谭浏阳三人相视如兄弟。”谭嗣同在《吴樵传》中称:“以长铁樵一岁,父事季清先生,而弟铁樵。过从日密,偶不见,则互相迢。”三人在相识后就约为兄弟之交,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

为什么能如此一见如故?首先,客观的历史环境为他们相识提供了前提条件。中日甲午战败后,帝国主义加紧侵华,民族危机加深,洋务运动宣告失败,维新思想家提出的“变法”主张得到迅速传播,并很快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。为了大力宣传维新思想,制造变法舆论,维新派在京、沪、粤、鄂、湘开始组织学会,创办报刊,开办学堂。开展这些活动,需要大批维新志士同心协力,结交“天下志士”就成了他们共同的愿望。

从主要角色的塑造而言,《白夜追凶》男一号关宏峰心性极其复杂,各种完全不相容的性格在他身上交织,对这个兼具黑白两面的人物已经很难简单地用正与邪、对与错之类的词语来评判了。首先,他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,却因在刑侦一线目睹了太多的牺牲而渐渐冷却,冰封了自己。对于“碰瓷”老太太对自己的讹诈,关宏峰没有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解决,更没有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进行威慑,而是在一番解释争论后最终拿出50元钱塞在了她手里。因为在他看来,老太太的做法虽然不对,但毕竟是可怜之人,自己应该接济。然而,正是这个对陌生人都充满怜悯情怀的人,却对身边的同事、甚至自己的亲弟弟没有丝毫温情。剧中,实习女警周舒桐因充作卧底而差点遭受侮辱,对此,刑警队长周巡火冒三丈,把涉事犯罪分子痛骂了一顿,就连放荡不羁的关宏宇也内疚得一只接一支地抽烟,唯独关宏峰无动于衷,只冷冰冰丢下一句:做警察,这点牺牲算什么!对于一直关心、保护自己的弟弟,关宏峰从来都是冷面相向,甚至在栽赃陷害之后也难得见一丝一毫的愧疚,除了呵斥还是呵斥。行走在黑白交锋的第一线,目睹了太多的流血和牺牲,内心的情感自然不是寻常人所能体味到的。由于矢志做一名正义的殉道者,在意识和潜意识中,关宏峰不仅把自己,也把亲人、朋友、同事一起奉上了正义的祭坛。

另一方面,关宏峰恪守着原则底线,作为一名警察,不会选择破坏程序正义来达到惩戒罪犯的目的,但当正常的破案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时,他又不会拘泥于程序正义坐以待毙,而会“不择手段”。剧中,周舒桐为了能给狡猾的犯罪嫌疑人定罪而做假证,受到他的严厉批评,在他看来,一个警察如果没有底线、没有原则,就与犯罪分子没有区别了。然而,当自己已被人陷害,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时,关宏峰却没有选择束手就擒,而是通过嫁祸弟弟来争取时间,如此一来,关宏峰欺骗了弟弟,欺骗了徒弟,欺骗了同事(同时也欺骗了敌人),口口声声恪守原则底线的他似乎成了“不择手段”的目的论者。此时,借用孔子的一句话似乎可为关宏峰的行为做个辩解:“可与适道,未可与立;可与立,未可与权。”在孔子看来,一个人矢志于道固然不易,可要学会权变则更难了。在陷入黑暗势力精心设计的栽赃陷阱后,关宏峰只有两种选择:一是束手就擒,乖乖认罪,这就意味着自己的冤屈可能永远得不到洗刷,幕后的阴谋也可能永远得不到揭穿;二是绝地反击,回击敌人以同等的手段,一招险棋脱身,虽然这对自己的弟弟极其不公,但会留下澄清真相的机会和“翻牌”的可能。当一个具体的事件严重到一定程度,潜在危害巨大之时,就需要跳出固有规则,为了寻求新的、最优的路径进行“权变”,就这一点而言,虽然我们在法理上、情感上无法接受关宏峰嫁祸弟弟的做法,但从理智上而言,不得不承认,这是一个绝妙的大手笔!

白天不懂夜的黑,但白天黑夜却同属一片天。正如有人所评论的那样,能对人性的黑白两面理解、描写得如此透彻全面,却又最能最终合情合理落在“希望”上,《白夜追凶》是值得珍藏珍藏的艺术品。

在昼夜追寻真相的路上,关氏兄弟“逆风踏凌霄,以光散黑”,终究会迎来光明的降临。只是,那开往白天的夜,究竟,有没有终点?



其次,他们志同道合,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在三人相识之前,他们都曾参加维新运动。梁启超参加了康氏领导的“公车上书”和北京强学会(任书记)并任《中外纪闻》主笔。谭嗣同与唐才常在湖南浏阳设立算学社,开湖南新学之先河。吴樵在武昌参与了汪康年等筹拟中的“中国公学”,参加了北京强学会的会务活动。此外,他们还有共同的爱好——钻研佛学。再次,三人都有很高的学识和修养,彼此又有令对方佩服之处。最后,同处一地则为他们相交乃至建立深厚的友谊提供了机遇。

梁启超在宣传维新思想的主阵地《时务报》任主笔,发表了《变法通议》一系列宣传维新变化的惊世政论,还协助创办了《广时务报》。谭嗣同其间写了《仁学》上下两卷,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,书中还深刻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。吴樵则奔走于沪、鄂、湘、蜀之间,也曾为《时务报》的创办和发展,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谋略,作出巨大贡献。三人都为维新思想的宣传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吴樵的早逝,使他自己丧失了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遇,也失去了像谭梁那样在戊戌变法中大显身手的机会。但他也自有功绩,正如谭氏赞誉的:“其所掌画,若报馆、若女学、若机厂、若矿产、若农田,虽不既举,而条理毕具。”“既不然,中国不有铁樵;中国有铁樵,则中国之事之待于铁樵者,不知凡几。铁樵必不死,而铁樵竟死,然则吾又将奚适也!”梁启超还为吴樵题写墓碑“天民吴樵之墓”。为中国富强而变革的理想,使三人走到一起,并且在短暂的交往后建立了不渝的友谊,这使我们看到,吴樵对谭梁以后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该被历史尘封的。



7版

文史·艺境

达州日报

生活

周刊

主编:蒲建国  
编辑:王晓梅  
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 
dzbszhk@126.com 2377721



王万邦故居



王万邦墓